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八八期 ——
(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4c)

【史海钩沉】文革中若干尚不清楚真实内幕的高层人事问题	陈益南
【五洲震荡】参与“文革”的外国人	郑光路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七）	周孜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文革中若干尚不清楚真实内幕的高层人事问题

• 陈益南 •

文革中高层的很多情况，这二十多年来，已披露公开了很多资料，使人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多的客观全面认识。但，之中，因种种原因，也仍然有一些高层内幕的详情细节尚不为人们清楚，使人们对那些东西只能猜测。不过，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料出现，以让人们真实全面的了解文革历史。

这里，是对文革中十个高层人事问题的一些看法与疑惑，仅供有兴趣者参阅。

（一）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总参谋长罗瑞卿首当其冲被撤职审查？

文革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已被国内外都认为是毛泽东选定的中央政治与军队首脑接班人的第二梯队主要成员。在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外出视察，都要带上罗瑞卿，甚至回韶山为其父母坟地扫墓，也叫上罗瑞卿同去。

然而，1965年底，罗瑞卿却就做了文革第一个遭遇整肃的中共高官，随后还被划入了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

现在能看到的各种资料，都说是因林彪想拉拢罗瑞卿未成，转而让毛泽东同意整掉罗的；而毛泽东因为要借助林彪来搞文革整刘少奇等，不得不违心地满足了林彪打击罗瑞卿的要求。

罗瑞卿平反后所说的一些讲话中，也只讲了林彪想拉拢他（在罗瑞卿看来），所导致的林对他不满的一些事。

但是，当时，不要说林彪凭其地位影响，有没有必要拉拢一个从红军时起就历来比他地位影响要低的部属，以壮其力量之事确否，或林彪敢以打倒罗瑞卿为条件去同毛泽东谈交易之事有没有可能，只从毛泽东当时的权威及其统帅性格，能否出现真要这样去讨好“借助”林彪的情况，都是大有可疑的。

况且，从权力角逐游戏规则平衡术看，照讲，林与罗虽级别地位不同，但都是毛的部属，而部属之间有矛盾，作为统帅一般是不会很偏袒哪一方的，除非某一部属有重大损害统帅本人的问题。

那么，毛泽东是出于何种原因，决定要整或同意整罗瑞卿的呢？具体详情细节是些什么呢？

（二）贺龙到底是因什么原因在文革中挨整的？

贺龙是十大元帅中，在文革中唯一突遭整肃并惨死于囚禁中者。

另一名元帅彭德怀虽也是在文革中被囚致死的，但彭是因1959年庐山会议老问题再次挨整所致，与文革高层斗争已无关系。

然而，贺龙在文革初，却还是很风光的，他还陪毛泽东一道检阅过百万红卫兵。

1967年初，贺龙突然失宠，并真正被打倒了，还失去了自由与正常生活条件，给囚禁了起来。

其他那些元帅们，除林彪在台上，彭德怀被红卫兵批斗，罗荣桓早已去世外，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人虽也受到一些大字报冲击，但尚无大难。就是所谓“二月逆流”即几位老帅们大闹怀仁堂事件，也没使毛泽东真正以此整他们。

但这贺龙为何却栽了呢？而且还栽得那么惨（他实际是活活让囚禁生活给整死的）？

现在能看到的说法是：林彪要整贺龙，而当时又传出贺龙要搞“二月兵变”的流言。

然而，林彪要整贺龙究竟是为了什么？

标准答案是“篡党夺权”！

只是这答案太标准了，没有具体细节，没有具体证据，实际等于没说。

而且，也有些可疑：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便倒了台，可是为何贺龙却并未因此受益，相反，直到1975年才首次为贺龙部份平反？

贺龙在中共历史上，除了作为一位军事诸侯参加了南昌起义，创建并领导了红二军团及后来的红二方面军那支力量最小（不足万人）的红军方面军部队外，他在解放军系统中并没有多少部属和势力。解放后，他虽也评了元帅，也是军委副主席之一，但他的工作重心很大程度，却是在他喜欢玩的部门即国家体委。

他的这些情况，表明了他既不会成为林彪篡权的重要障碍（如果林彪真在篡权的话），也不可能因什么子虚乌有的他领导的“二月兵变”阴谋之事出现，而遭到毛泽东的疑忌，被毛泽东整肃。

所谓“二月兵变”的流言最开始是出自于红卫兵的小报，而起源又因要批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这李井泉不仅曾是贺龙的部下，更是西南所谓“三线”战备系统工程的总指挥。当时，那个神秘神秘的“三线”则被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当成搞政变搞阴谋的事了。既是搞政变的军事阴谋，当然少不了有贺龙的份了。

可是，对这些流言，毛泽东还不知道其真伪吗？事实上所谓“二月兵变”一事，也从来没有作为官方的什么证据过。

但，贺龙究竟是由于什么具体原因而惨遭挨整的呢？

在贺龙的平反追悼会上，周恩来沉痛地对贺龙夫人薛明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

究竟是什么事，使周恩来也无法保住贺龙？

（三）毛泽东为何突然要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整下去？

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位秀才，在文革中是有过红极一时的经历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他们，在文革初期，用他们那很受毛泽东赞赏的笔杆子，确为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立下过不小的汗马功劳。仅戚本禹写的那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就让刘少奇读了气得吐了血。王、关、戚三位也凭其笔杆子才干，在文革中晋升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然而，没有多久，王、关、戚却很快从高位跌落了。还是文革高峰中的1967年8月，毛泽东就让杨成武带人将王力、关锋给抓了起来，关进了秦城监狱，对其“以观后效”的戚本禹，没过多久也被囚禁审查。

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还联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盛大的“百万军民”大会，热烈欢迎从武汉“七·二〇”事件中安全脱险的王力、谢富治回京，以示声讨有叛逆行为的武汉军区的陈再道上将。

可是，十天之后，被中央文革视为十恶难赦的陈再道，却被毛泽东特批“同志”称呼，并没被打倒，仅送去学习而已。可是，文革“功臣”的王力、关锋却在同样是十一天之后的8月10日，在莫名其妙中倒被关了起来。

根据现能看到的资料中说，是由于王力于当年8月7日对外事口造反派作了一个著名的“八·七讲话”，之中，观点极左得很。另外，则是王力、关锋在当年当期的《红旗》杂志上，

组织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有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因而，激起了毛泽东对王、关、戚的不满，指责他们是“毁我钢铁长城”。

当时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其回忆中，也说了周恩来让他将包括上述内容的材料，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批阅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在看了材料后，让杨成武在毛泽东住地等一天，然后，第二天，毛泽东才作出抓王力、关锋的决定。开始，毛泽东的命令中，还包括了抓戚本禹，但在向杨成武下达他的决定令后，中途，又犹豫了一下，结果，还是让杨成武在命令中去掉了戚本禹的名字，说：对戚先再看看，以观后效。

决定王、关、戚下台的情况细节，应该还是比较清楚了。

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毛泽东决定让王、关、戚下台呢？

如果说是因对上述王力的“八·七讲话”与《红旗》杂志上的“揪军内一小撮”的观点言论不满，按常情，毛泽东完全可以对他们进行指责纠正就是，也可以撤去他们的一些负责职务，也完全属执行正常工作纪律。但，一下子却将他们三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上述理由似不够充份。毕竟，王、关、戚都是协助他毛泽东、为文革进行而推波助浪的干将，是属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人，何况，十天前，中央还将王力作为一个文革大功臣而举行过盛大的欢迎大会呀！

周恩来托杨成武送给毛泽东的材料中，究竟还有什么内容？是否还有些杨成武现在也不能说的东西呢？

为什么毛泽东在看了杨成武送来的那些材料后，不能马上作答，而需要他思考权衡一整天？

当时毛泽东能宽容有反中央性质的武汉“七·二〇”事件的首要陈再道，为什么他却会下如此大的决心，对王、关、戚采取一杆子整到底的断然措施？

为什么毛泽东对处理戚本禹还是有些犹豫不决？

（四）1968年3月30日对杨、余、傅的突然打击。

1968年3月30日，在军队的一次大会上，林彪直接出面，宣布了军委的三个决定：（1）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并予以审查；（2）审查北京警备区司令傅崇碧；（3）逮捕法办空军政委余立金。

指控杨、余、傅三人的共同罪名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线”与“搞右倾翻案风的小爬虫”。

现在已知道，傅崇碧是因为一些包括鲁迅文稿等档案材料的存放问题，无意中得罪了江青所致；而余立金则是因与空军司令吴法宪有些矛盾，而加上又有人检举证明他在“皖南事变”中有叛徒行为，而林彪是支持吴法宪的，故顺势将余立金撸了下来。

相对来讲，整这二个人还是顺便的“小事”，真正的大事是将杨代总长给撤职、审查。

在文革开始端掉总参谋长罗瑞卿后，就由杨成武担任了代理总长。文革的头两年中，毛泽东看来是很相信杨成武的，到哪儿去视察，都带上杨，他有什么指示，也经常由杨负责代为传

达，并且，杨经常以中央领导人之一的身份处理地方与军队内的文革问题。然而，为何却突然一下子又给打倒了，还被囚禁起来（长达六年！）？

对此，杨成武在说到这事时，也只说是林彪想拉他，他却并不想做林彪集团的人，而只愿服从毛泽东指挥，因而，得罪了林彪，才招来此祸。如同罗瑞卿总结的那样。

但是，这些说话，却不能解释一个重要事实：即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任何重大的人事任免，均须由毛泽东才能决定，而不是由林彪所能说了算的。没有毛泽东的同意首肯，谁敢撤杨代总长的职？！

毛泽东为何要撤免杨成武，还将杨打为阶下囚呢？不知道。

现在没有什么资料披露这方面的情况，连杨成武在回忆中自己都没说清楚，或是不愿意说。

当年，给杨成武安的另一个大罪名，是所谓“借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之名，大树（杨）自己的权威”。这个罪名，当然是属于“莫须有”之列，当时就是连老百姓也都不相信。因为，人们起码的常识都知道，凭他杨成武那始终头上还顶个“代”字的总参谋长之份量，哪里够得上“大树”自己的份儿！杨的上面离毛泽东的地位还差多少级台阶呀？！杨成武有这胆吗？！

这罪名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让杨成武垮台了呢？

（五）毛泽东为何突然要整倒陈伯达？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文革中期召开。陈伯达在这次大会上，以中央文革组长的“功臣身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成为中共最高领导机构的五人常委之一。当时，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组成的中央常委，被称为最革命最强大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个“司令部”将要领导中国人民若干年，以早日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仅仅一年多时间，1970年8月，陈伯达就从这个最革命最强大的“司令部”中被开除出来，而且还被冠以一个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一落万丈堕入到那可怕的秦城监狱。

导致陈伯达倒台的公开原因，是陈伯达于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论天才”的小册子，在会内到处宣传毛泽东是最伟大的天才，由此，鼓动到会的中央委员们拥护毛泽东出来做国家主席。结果，毛泽东不但不称赞陈伯达，反而怀疑陈想与林彪集团结盟，搞什么阴谋，因而，“龙颜大怒”，亲自动手又写了一张内容极夸张、语气则愤怒之极的大字报（也是文革中毛泽东写的第二张大字报），指责陈伯达有“炸平庐山之势”，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们”，不懂马列，是“政治骗子”。

结局是，庐山会议一结束，陈伯达便被关了起来，没有任何过渡形式。

毛泽东的疑心，固然是陈伯达倒台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作为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大师级人物，难道会就凭陈伯达那些充斥了书呆子气的活动，而对其施以如此沉重的打击？甚至连给其稍稍过渡一下（如撤职、降职等）的喘气机会都没有，便直接将他从“最高的司令部”而打进监狱？

从延安时起，陈伯达就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对于陈的书呆子气，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早已熟知，为何对这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举动，毛泽东就这么大的火？而且至毛泽东在六年后的1976年去世，毛泽东都始终没有作过对陈伯达可以网开一面的批示。而在1974年后，毛泽东对罗瑞卿、杨成武都给予了宽恕，放出来，安排工作。

陈伯达到底还有些什么事，惹得毛泽东至死也不愿原谅他呢？

陈伯达在自己的回忆中，对此，他也莫名其妙得很。

（六）康生称病内情有没有其他玄机？

康生注定是一个要被打在耻辱柱上的人，谁让他从进入中共领导层后，就长期从事领导特科、情报、锄奸、安全、审干方面的工作！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已众所周知，勿庸多言。

但，自陈伯达在1970年8月倒台后，康生便不太在公开场合露面了。1973年的中共“十一大”上，他虽坐着轮椅出了一下面，并被选为中央副主席之一，但之后的批林批孔运动，已基本没有他指手划脚的痕迹了，直至1975年12月去世。

文革十年，康生在中途却似乎歇了下来。

现在资料都说，那是因他病重所致，无法再在政治舞台上演“党阀”主角了。

但，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西省委书记之一的刘俊秀有一个多少多少“想不到”的讲话，被揭露出来，并遭批判。其诸多“想不到”之中就有一条：“想不到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老会从此甩手不干！”

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令陈伯达倒台的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

刘俊秀的这条“想不到”，似乎揭示了另一个历史真相：康生在文革后期主动隐退，并非全是疾病所致，而有可能与陈伯达的倒台有关。当然，不是他康生本人受陈伯达问题牵连，因为，在中共“十一大”上他仍任要职。

也许，是他对毛泽东将他为数不多的“文革战友”陈伯达整下台这一做法很不满，“兔死狐悲”，因而称病告退，“甩手不干”了的。

但，这个观点目前尚无其他资料可佐证，而仅仅有刘俊秀的这条“想不到”。

不过，刘俊秀时任江西省委书记，他说的东西应该不会全是空穴来风。

另外，毛泽东与康生的关系，显然比与陈伯达的关系要深一些。

自在延安时，康生在毛泽东与王明的较量中，就敏锐地不再支持王，而坚决转到毛的这一边起，康生就成了毛泽东的一员能干与甚至可以推心置腹谈私下话的特别助手（当年，江青就是由康生出力撮合给毛的，并且在其他政治局同志不赞成此桩婚事时，康生则极力支持了毛），而康生的工作性质，更使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康生比毛泽东还小五岁，但毛泽东在文革时的

公开场合下，有时都称之为“康老”。可见二人关系的特殊。

陈伯达那个书呆子做做事可以，但他一直就不可能与毛泽东建立象康生有的那种亲密关系，所以，毛泽东在批陈的庐山会议的大字报中气愤地说：“我与他（指陈伯达）共事几十年，从来就没有很好地配合过！”

因而，陈伯达触犯了毛泽东，毛当然就会极为不满，但康生若在毛面前耍一点小脾气，毛泽东则可能会以大度之态处置对待。康生在毛泽东面前似乎有这个本钱。

（七）林彪事件

林彪问题是文革中最令人震惊、至今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最大事件。

这些令老百姓们疑惑不解的问题，大致有：

（1）象林彪那样一个已身患重病怪病而大部份时间只能坐在黑房间里的人，一个连文件都不想看看，而只能勉强让秘书先读给他听听而已的人，一个甚至要在颠簸不停的汽车里才能睡着觉的人，一个在天安门城楼“五·一”晚会上连稍坐久点时间都不舒服而要离开的人，一个因病而几乎对生活都没有多少兴致了的人，会不会还能对高层权力有着疯子一样的欲望？

（2）林彪篡党夺权、搞反革命政变的罪行证据，如果，排开那些只有工作职责联系上的关系、矛盾，而不是用现在的观点来推断的事，还有什么可以更有力可以说服人的证据呢？

在有关林彪罪证的材料中，除了那些描摹古人话语如“克己复礼”之类的条幅外，还有两样东西被列为重要证据：

一张林彪亲笔写的手令，内容是“盼照宇驰、立果同志意见办。”

还有一张则是从黄永胜处缴获的纸条，内容是“林副主席一号命令”几个字。

“宇驰”即周宇驰，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立果”则是林彪的儿子，时年27岁，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至于这孤零一张“盼照宇驰、立果同志意见办。”的字条，究竟要办的是什么事？是不是就肯定就如罪证材料中所说的“搞政变”的命令？

而那“林副主席一号命令”的纸条，可以理解为黄永胜准备执行林彪的“一号命令”。但是，我们现在已知道，那所谓“一号命令”，也就是准备与苏联打仗，而要将中央一些老同志（包括正在“审查”的一些老同志），如陈云、朱德、李富春等人，与有“问题”的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等人，安排离开北京到外地去的那回事情，并不是林彪搞政变的命令。

（3）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与他那帮少壮军人、所谓的“联合舰队”们，搞的那份《571工程纪要》，确是对毛泽东本人与文革等很多中国现实问题，进行了抨击，确也具有1924年间日本青年军人推翻文官政府而搞军国主义政变的那股味道，他们也确将日本海军的“江田岛”精神奉为楷模。

但，他们在《571工程纪要》中所表明的很多观点，实际与下层当时很多思想激进的青

年人想法一个样，只是在改变社会的具体做法设想上有区别。

但，林立果等人的行为，与他父亲林彪及其集团有没有直接联系呢？

现在，似乎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全貌材料。

至于《571工程纪要》这一文件，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行动纲领与指令，而基本都只是一些政治抨击与观点的集合。林彪垮台后所下发的其罪证材料中，说《571工程纪要》中的“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恐怕有点牵强。

（4）“九·一三”那天，林彪究竟是如何登上三叉戟飞机的？他究竟是不是想叛逃？这飞机究竟原先是打算飞哪儿？

只有事情的动机才能说明事情的性质。

据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豆豆）说，是他哥哥，在其母亲叶群的协助下，将林彪强行弄上飞机的。

而林彪飞走后，其手下的几员大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却毫无所知，还协助周恩来采取空中管制措施等。这，象是一个在搞政变的样子吗？

不知要到何时，才能有些什么资料，可以帮人们清晰地解开这些谜团。

（八）毛泽东是如何选定王洪文当中央副主席的？

在1973年的中共“十一大”上，时年39岁的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竟然当上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成为了中共第三号领导人，并即刻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对此，相信包括当时全国造反派的成员在内的所有人，以及国内外所有的中国政治问题的专家们，都一定个个瞠目结舌，大出意外。惊奇万分。

王洪文究竟是以什么条件，成为了毛泽东再一次选定的中共领导的接班人？

或者说，毛泽东是以一些什么标准，选了王洪文来做他百年之后的继承者的？

是想选一个造反派头头，以便保证以后能将文革开辟的这个新政治格局延续下去？

但，为什么全国除上海以外，却又没让其他省（区）的造反派头头们也照此体制格局，也一一安排做省（区）委书记、副书记？相反，当时，很多造反派头头不仅没有进入掌权者行列，而且还被关在监狱里，或戴着“反革命”“516分子”等罪名，尚在另册。既只选了一个王洪文做接班人，而并未让全国的造反派头头都一一在各省各地接班，以形成一个造反派掌权的体制，这就说明，“造反派头头”并不是毛泽东的选拔标准。

是想选取一个有魄力能担大梁的人，以保证毛泽东百年之后，中共领导能顺利交接班，而不会处于一个“血雨腥风”的环境中，且能将毛泽东开创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王洪文在上海造反时，为保持已由造反派一统的安定局面，他率领“工总司”在总体文质彬彬氛围的上海，就敢以武力断然镇压反对派“上柴联司”。那一幕，当时毛泽东不仅通过电视

直播全部目睹了，而且，对王洪文在此事中的果敢决然性格，给予了很高评价。

但，这只是王洪文能入选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还不是充份条件。因为，象有王洪文这种能力的造反派头头，全国能找出不少。

关于毛泽东如何选定王洪文的详情，至今未能看到全面资料，而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只言片语散落在各种书报上。

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后，其短处显现很多，因此，1975年，毛泽东便让他退了一下，而让邓小平出面主持中央工作。但，对王洪文仍寄厚望，找他深谈，要他多读书，不要与江青等人混得太密，要注意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处理好关系，告诉他已是中央的领导人了，而不仅仅是上海的书记，不要搞“上海帮”“四人帮”等等。

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这一次选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又是一次看错了人。

历史也已提供机会让王洪文自己证明，他显然不具有做统帅当领袖的才干。

如果王洪文真有几刷子有几手的话，中国的历史则将是另外的一些画面了。

蒋经国、金正日都能顺利接班，而王洪文却反成了阶下囚，这之间，不谈政治性质，应该还是有个能力问题。

（九）毛泽东的临终遗嘱中，究竟要定谁接任中央主席？

毛泽东有没有一个临终遗嘱？按当时那种情况看，列宁、斯大林、胡志明去世都有遗嘱，毛远新又天天守在他身边，毛泽东无疑也会有一个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内的临终遗嘱的。只是，至今，中国的老百姓们一直没能看到那份东西。西方港台的媒体上虽然经常抖出一些毛泽东“临终遗嘱”之类的文章，但，其可靠性其文风都令人不敢相信。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上台当主席后，官方公布了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说是毛泽东指定华国锋接班的“临终嘱托”，给人一种似乎是毛泽东临终遗嘱的意思。但，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你办事，我放心”那纸条，从逻辑上讲，不会是毛泽东的临终遗嘱。

但，不知为何，官方至今也没有公布一份正式的毛泽东的临终遗嘱，以正视听。

毛泽东在其临终遗嘱中，有可能会指定谁做他的接班人呢？应该是王洪文。

这个判断也没有直接证据，而只一点间接的信息。

在“四人帮”垮台后，中央发下来的批判材料中，有毛泽东早就批评“四人帮”的一些话语。其中，有一段批江青的话：“江青有野心”“她想要王洪文去做（人大）委员长，而自己当党的主席。”

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不可以理解为：王洪文本是安排当党的主席，江青却想自己坐上去，而要王洪文去改做人大的委员长。

当然，这只是从逻辑上的推断，至于毛泽东究竟指定谁当他的接班人，还待真正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布之日，才可下结论。

（十）倪志福为何能成为当代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

倪志福在中国政坛这三十多年的历史中，虽不说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但他却默默地创造了一项纪录：自在文革中崛起三十多年来，历经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直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倪志福竟然就一直稳居政坛高位，安然无恙，始终是一个政治上的不倒翁。

这在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中，是绝无仅有的。

从文革中召开的中共“九大”起，又经历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共七届中央，他一直担任了中央委员；其中，十届是政治局侯补委员，十一届、十二届则是政治局委员。文革也罢，“两个凡是”时也罢，改革开放也罢，老倪他却始终没有入过另册，而总是每个时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倪志福原是北京永定机械厂的一个工人，发明了当时著名的“倪志福钻头”，因而成了“全国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文革前在本厂技校大专毕业，晋升为工人工程师。文革开始时，倪志福仅33岁，不可避免会卷入到造反的工人运动中。

尚不清楚老倪在首都当时是搞的什么群众组织。只是我们知道，另一个著名全国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曾是做了保守组织（首都革命工人捍卫团）的头儿，加之时传祥曾与刘少奇握手的照片太惹人注目，结果竟被整死了。

倪志福却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以工人代表的身份登上了政坛，也从此告别了他的工人生涯。

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他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他更与王洪文、陈永贵一道，进入了政治局，当上了政治局侯补委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1976年4月发生的第一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时，倪志福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总工会主任。当时镇压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的“四·五”事件中，首都工人民兵充当了打手。四人帮垮台后，工人民兵总指挥马小六等被整肃，北京市公安局长被审查。但，这些却竟然与倪志福无关。

四人帮的垮台，不仅没有给倪志福带来厄运，相反，他还在华国锋执政的中共“十一大”上，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1980年华国锋下台后，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那四位同样也是在文革中崛起的政治局委员或副主席，也一道以主动辞职的方式下了台。但，倪志福却又留下了。并且，在胡耀帮主政的十二届中央里，仍保有了政治局委员这一要职。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倪志福虽不再在政治局有职务，但却以老同志身份做了两届、十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现在，仍在发挥党和国家领导的老同志的余热，不时出席一些中央级大会。

邓小平复出后，对那些在文革中做过造反派，或是“坐直升飞机”提拔上来的领导干部，历来极为反感，甚至深恶痛绝。所以，文革中提拔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侯补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姚连蔚、孙健等人，便被先后一一撤职处份，打回原地。

但，奇怪的是，邓小平却没有抹去倪志福，还留用他继续当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在十三届政治局里虽没有了老倪的位置，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留给了他一席，并且任了两届。

如果说毛泽东要起用倪志福，是因文革原因；而华国锋也重用了倪志福，是“凡是”派的需要；那么，坚决否定文革的邓小平，又是什么原因对在文革中崛起的倪志福也能另眼相看呢？

倪志福真是一个谜。

~~~~~

## 【五洲震荡】

### 参与“文革”的外国人

• 郑光路 •

#### ◇ 美国专家写出“造反大字报”

1966年，狂潮陡起，神州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了！我们这些当过红卫兵的过来人都记得：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红旗如林、“万岁”声如雷，广场上百万红卫兵哭着、吼着，成为一片躁动翻腾的红海洋。

斯特朗和其他一些外国人也深感荣幸，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这时，穿着草绿军装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把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左胳膊上。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当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他说：“要武嘛。”从此，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年轻的红卫兵认出毛主席身边有位白发苍苍、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老太太，他们欢喜极了，叫道：“这不是1946年在延安采访，毛主席和她笑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美国女记者、被称为‘纸老虎女士’的斯特朗吗！”红卫兵一下子围上去，把红彤彤的“红卫兵”袖章也戴在了她的胳膊上。斯特朗幸福而庄重地说：“你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要记住毛主席的话……”

斯特朗十分敬仰毛泽东，文革初起时，80岁的她也热血沸腾，在《中国通讯》中以8页半的篇幅介绍“文化大革命”，向国外心存疑惧的外国人解释说：它不是“一场接班之争”，而是“改造人的灵魂并建立新世界的梦想！”

当时热情讴歌甚至亲自参与“文革”的外国人很多。1966年8月后，在中国的许多外国留学生、专家，也像中国学生一样，搞起“大辩论”、“大字报”。

来华工作的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等四个美国专家写出了题目为《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咄咄逼人的大字报：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待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我们要求：……七、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八、取消特殊化。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美国：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 1966年8月29日

大字报火辣辣的“革命造反”风格，和无数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在十天后的9月8日，对四位美国专家大字报作了批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意作。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八日

“自愿”二字下，打了两点，表示重要。

美国专家的大字报和毛泽东批示立刻在全国引起重要影响。笔者保存的“四川省人委交际处、外事办公室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1967年11月第九期《红旗战报》上，为此“集中火力”批判四川“修正主义外交路线”……

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寒春，在揭发批判外国专家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谈到她获悉毛泽东批示的消息时说：“现在，我们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没有框框，他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者 他无限相信人民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只用了几个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分裂世界无产阶级的阴谋诡计砸得稀巴烂！我们摆脱了枷锁！大门向我们敞开了！现在靠我们自己去游泳了！”

大字报四位作者中，阳早和寒春是一对夫妇。阳早是美国农学家，1946年就到中国，决心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面貌。寒春原在美国从事核物理研究，曾参加过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与杨振宁在同一研究小组。她为了爱情和理想，1948年追随阳早来到中国。夫妻二人到过延安、黄土高原、内蒙古大草原、西安草滩、北京郊区农场……二十多年来像中国人一样，为中国农牧业机械化辛勤地工作。

文革结束后，寒春曾讲到她和丈夫阳早写这张大字报的一些情况：从1959年开始，外国专家享受特殊待遇，生活优越。“文革”开始后，有关方面又以“安全”为理由，不让他们参加中国这场大运动，成天被关在饭店里，不许随便上街……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他们热血沸腾，仿效红卫兵写出这张大字报！

毛泽东为四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作出批示后，北京不少外国专家也纷纷“造反”了，建立起“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国际燎原造反队”等造反组织。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李敦白出身名门，原是美国共产党党员，17岁开始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46年，他在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时，认识了周恩来，后来来到延安。1949年初，他因为所谓“斯特朗国际间谍网”成员问题被逮捕，含冤入狱6年多……出狱后他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认为他保留美国国籍更有利于中美友好交往，他才放弃了这一要求。

“文革”开始后，李敦白成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这个外国专家造反组织

在1967年夏天时已有70余名成员，倾向于支持当时北京“红三司”等最激烈的造反派系，李敦白也由此成为活跃于北京群众组织间的风云人物。

1967年“一月风暴”掀起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身份参加了广播局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夺权”斗争，当上该单位“革委会”领导成员。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1967年4月10日，国内有名红卫兵组织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慷慨激昂的重点发言：

“七年前，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赫鲁晓夫揭露出来了，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立了一大功，除了一大害。今天，中国人民，清华井冈山的战友们，揪出了一个王光美，揪出了一个刘少奇，揪出了另外一个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这是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我们感谢你们！”

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部长陈毅的高潮中，李敦白也跳上台情绪激动地批判道：“外事口，口对外，就是干革命，干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领导权一定要，也一定会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决不允许在右派手里，也不允许在中间派的糊涂蛋手里！所以，一切犹豫不决的人最好赶快站过来，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造反派所谓的“右派”指的是陈毅。

当时，李敦白多年好友马海德医生，曾劝说李敦白：应该远离中国的政治纷争。可陷于狂热中的李敦白听不进老友劝告……多年后，李敦白才在其回忆录中沉痛反思：“在那些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里，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

风云莫测，1968年2月，红极一时的李敦白却被当作“国际间谍”被捕入狱，滑稽的是：他曾激烈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却被专案组说成是刘的“同党”，硬要他承认领导着一个“国际间谍网”，而王光美就是其中成员，并通过她发展了刘少奇……

#### ◇ 免费“大串连”的洋人

列车上、马路中、山道间……一杆杆鲜红的“红卫兵”战旗、一声声南腔北调的“革命歌曲”，特殊年代千军万马般的“朝圣者”，向红色圣地北京、井冈山、延安……前进！前进！这就是1966年8月后红卫兵“大串连”的情景。

可能连许多过来人也不一定知道：在那癫狂般特殊年代，一些洋人也在中国大地上免费大串连！

湖南省韶山被称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蜂拥而至的红卫兵队伍中，出现许多白肤黑肤、白发黄发、蓝眼睛褐眼睛的外国人。中国红卫兵涕泪横流大呼“万岁”声中，这些洋人也大受感染、热血沸腾。尤其一些来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激动万分地叽哩咕噜高呼：“中国，毛泽东！中国，毛泽东！我们要拿起枪杆子，走中国武装革命的路！”甚至有些人还想成为他们国家的毛泽东呢，要马上赶回国去点燃“星星之火”……据粗略统计：1966年10月间，仅去韶山的外国人就达3000人。他们中不少人确实崇拜“缔造红色中国”的毛泽东，当然许多人不过趁此良机免费旅游，全世界哪有此等好事！入乡随俗，他们像模像样地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胸前佩戴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像章，一幅虔诚的“红色朝圣者”形像。

免费串连的洋人有优先参观的特权。他们也不必像徒步串连的中国红卫兵走得气喘吁吁、

有时队伍七零八落如败军之将……洋人们有车接送。当成千上万的中国红卫兵挤得汗流浹背、脚被踩肿去瞻仰革命圣地时，洋人们被送到不排队地方从容参观。还常有非洲等地留学生，在毛主席故居等“圣地”咕咕噜噜地学习《毛主席语录》，早已准备的记者立马拍摄，登在报上的“世界人民爱毛主席的书”大照片，让文化大革命锦上添花……。

据当时报导：在延安，有些日本人对接待者说：“我们强烈要求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睡一下，亲身体验毛主席当年革命经历！”但那窑洞最多挤十多人，日本人急了，叽哩咕噜说：“我们从北京到长沙、韶山，又到井冈山、延安，就是按中国革命的进程串连的！若不认真体会圣地的窑洞，怎能算取革命真经呢？”有人想了很久肃然说：“每批人在窑洞睡两个小时，一天可以睡几批人！”于是皆大欢喜。

当时北京的大学、重点中学，都有外国留学生。在北大附中读书的村山喜二，父亲是日本大学教师、中国问题专家，他没料到儿子在中国成了具有红卫兵思想的日本少年。当时口号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都要到农村劳动。但郊外有市公安局的牌子：“外国人不得逾越！”村山喜二不能下乡，难过万分，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能和中国学生有同样待遇、同样革命！”

“文革”开始后，村山喜二如猛虎出笼，和中国的红卫兵一起“造反”起来。他曾和不少高干子弟以“联动”的名义冲击公安部，被抓住受审查。那些高干子弟后来一个个都释放了，而村山喜二经审查，才晓得是个“洋红卫兵”……当时还怀疑：“他是不是‘日修’派遣的特务？”

有关方面不敢怠慢，急急忙忙上报。“中央文革”下令：尽快释放！

大串连开始，他联络了几个日本小孩子，也打起红彤彤的战旗去“长征”。在延安窑洞，他就是排队在窑洞睡了两小时的洋人之一。但他还觉得不过瘾，又花两天时间排队，再度体验毛主席住窑洞的峥嵘岁月。从长沙徒步“长征”去韶山，他庄严肃穆地对另几个日本小朋友说：“如果毛主席当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中国还像今天的日本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又风尘仆仆到广州去瞻仰“农民运动讲习所”，却听说接待单位不让外国人“大串连”。眼看饿肚子还要露宿街头，几个日本孩子灵机一动，决定用同班同学于晓园、张东明、贾宝全等人的名字，冒充中国红卫兵，果然被热情安排食宿。村山喜二说：“多亏我们会讲北京话！”……有趣的是：二十年后，村山代表一个日本商社来华，宾馆见他北京话溜熟，以为是“冒牌”日本人，再三盘问。这个当年走南闯北的外国红卫兵，只好用流利日语说话。宾馆于是彬彬有礼了，这让他感叹不已……

文革中许多外国人和组织来井冈山瞻仰。据统计，1966年到1975年，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来到井冈山……当时的报纸报导：他们像中国的红卫兵一样虔诚。有的人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毛泽东旧居土墙上剥点泥土，有的人在井冈山“毛泽东战斗过的地方”捡几粒石子，有的人在“毛泽东背粮休息过”的路边采几片树叶……他们把这些东西收藏作永久纪念。他们喝着山泉，说：“这是毛主席喝过的水，喝了会心明眼亮！”有一天，一个哥伦比亚的革命者站在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的桐木岭哨口，大作深呼吸。陪同的中国人以为他身体欠安，忙问吃不吃药？他豪迈地说：“这是毛泽东同志用革命暴风雨洗涤过的空气！”时值盛夏炎阳似火，他不肯戴草帽，又豪气冲天说：“我需要毛泽东思想的太阳！”

就在中国人大搞个人崇拜的时候，来串连的外国革命者也着凑热闹。一个日本人提出批评性建议说：“现在仅仅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这是不够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世界革命的普遍真理！”

来自非洲刚果的一位外国人，白天跑了一百多里瞻仰多处革命遗迹，非常疲劳，可是晚上睡前比中国红卫兵还展劲，他翻开“红宝书”，读到深夜两点多……大串连中，来自世界五大洲的许多外国人，同中国人一样沉醉在文化大革命的梦幻中。

#### ◇ 文革波及海外

1966年8月后，文革运动进入到“破四旧”等疯狂阶段。红卫兵一度冲击外国驻京使馆，一些在中国任职的外国人，为显示他们比中国人更革命，更热爱文化大革命，也频繁地指挥极端分子，有的英国人后来甚至被中国当局斥为“极左”组织“5·16”小组里的成员。

8月22日，一大群人聚集在英国代办处的使馆外，黑夜降临时，红卫兵架起了聚光灯，晚上10点30分，他们突然冲进了领事馆的院子，焚烧停在游泳池旁的小汽车，接着又砸碎窗户，捣毁家具，并用汽油在楼内纵火……造成国际影响极恶劣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英国代办处工作人员唐纳德·霍布森事后给他妻子信中说：“大约有五千人在院子里，一眨眼功夫，我就被打得浑身青紫。谁都可以用他们手中拿着的任何东西打我，只要能够得着。在一片暴怒中，女人们猛撞我，企图用她们的棍棒将我打晕。他们还揪住我的头发，想用我脖子上的领带将我勒死……”所有的馆员们被强迫向毛主席鞠躬，遭到拳打脚踢。令人意外的是，打英国外交人员的，还有参加文革运动的英国人！一名英国外交官事后说：“真正最恐怖的，是这群殴打袭击的暴徒中，有一些英国人，其中有一个头目还是出身‘豪门’，她穿着手工缝制的半统靴在一幅英女王画像上跳来跳去！”（见《大风暴》第25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这次“极左”事件，受到周恩来总理严厉斥责，还惩处了一些肇事者……

一些中国红卫兵以“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人民”为己任，要把文革之火烧到国外！一些外国人的“左派”组织也以“毛泽东主义”为旗号，搞起类似“文革”的极端行动。如法国1966年后有叫“革命万岁”和“无产阶级左派”的组织，等等……

驻某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也成了“造反派”，在异国大街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大使馆附近张贴“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幅标语，东道国提出了抗议。

另驻某国大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巨幅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地官员自豪宣称：“要让世界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该国局不同意，他们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驻非洲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泽东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殴打、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了香港。广州的红卫兵组织不断有人秘密潜入香港，对香港的示威活动进行声援。他们在香港外国人、华人帮助下，把学校、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和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

几乎同时，澳门的华人、英国人、葡萄牙人”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对他辱骂和围攻……

在英法等国家出现了以国际红卫兵名义张贴的大标语：“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还出现了“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等。在美国，也出现了“左派”的标语、传单。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摆在大小书店出售。在非洲，更有强向当地群众宣传革命，往人家怀里塞“红宝书”的事发生……

欧美当时也出现了类似红卫兵的打着“毛泽东主义”旗号的组织。令人奇怪的是，文革结束多年后，早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唾弃的“文革”，在国外居然幽魂未死。作家韩少功1988年到美国访问发现：这里居然还有红卫兵的后继者在公开活动！韩少功将离开旧金山，夜已经很深，在冷清清的电影院大门口碰到一位姑娘正在发传单，传单印着毛泽东头像、《白毛女》剧照和黑体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委员会”，传单上鼓吹说：“今年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从1966到1976，中国亿万人民投入了彻底改造社会的斗争…创造了很多新生事物：赤脚医生，造反学生……”

1999年，新加坡一间以湖南菜招徕食客的“毛家餐馆”开业，侍应生以全套红卫兵装扮，厅内文革照片甚多……

国外如此，国内银川2000年12月19日也开张的一家名为“人民公社大食堂”餐厅，以怀念“文革”的方式招揽生意。而成都一家报纸2001年11月7日报导：“文革风”“席卷”蓉城百卉路上一家取名“红光公社”的迪吧：迪吧内到处贴满了文革标语，数十名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肩背黄军包、头扎羊角辫、手握红樱枪的“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汇报表演”横幅下的舞池中，大跳文革时期“忠字舞”之类。四周墙面上贴满“做红卫兵光荣”等数百张“文革”标语，火辣辣的文革气氛几乎让人感到时光倒转30多年……。这些假“红卫兵”们虽然卖力，生意却并不好。亲身经历过文革磨难的未来人气愤地说：“商家招揽顾客心情可以理解，但那段历史给中国造成无穷灾难，这样作有好处吗？”

党中央早就下了结论：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要彻底否定文革；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任何范围内重演！事实上，早在当年“文革”时，无数中国人和曾支持“文革”的外国人，已在怀疑和反思那场疯狂运动了。

《炎黄春秋》杂志1998年第4期武际良的《斯特朗沉痛反“文革”》一文中叙述：文革时在中国的斯特朗，由最初支持而很快变成反对“文革”了。她看到学校停课、学生造反、批斗老师，她称这是运动中“最具有混乱性的特点”！其实何止于此，美国哈佛大学早就开设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课程，吸引了众多的外国学生，以致教室因拥挤不堪而连续更换新址。据统计，1997年选修“文化大革命”课的学生共计370人，分为27个班。校方仅助教就请了10名，在以提倡文化多元为标榜的哈佛，出现这样规模的“大课”，是近年来少见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主讲“文化大革命”课。他认为：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四人帮”的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终结。邓小平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今天，当我们回想起30年前的“文革”时，和那些曾卷入其中的外国人一样，心情是沉重的。

~~~~~

【往事追忆】

红卫兵小报和我（七）

• 周孜仁 •

（续上期）

也就在发完复刊号稿子的那天黄昏，吴庆举和另一位同学一起来编辑部来找我。该同学叫何国光，电机系五年级同学，瘦高个儿，生性耿介而善良。大学时酷爱文学。而今退休还家，成了重庆地区小有名气的集邮专家。文革那会儿，我离开战报期间他曾任过主编。而吴庆举，前面说了，是815的理论家，他俩一起来，肯定是关于写文章的事。果然，吴递给我一篇文章，信签纸写的，密密麻麻，好一大摞，算是大块文章了。造反派的文章后来都越写越长，大约受中共大骂苏共的所谓“九评”影响，于是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好像掌握真理的多寡和文章的长短成线性比例关系，越长则越革命，越有理论色彩。吴说这篇文章他和何推敲了三天。松林坡礼堂马上要开辩论会。他显然想把这篇文章拿到会上一炮再红，一如当初他的“走一二九道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一样。但现在，恰恰是文章的长度让我深感不安。我说，这种场合，最主要的，是需要煽动。这么长，大家接受吗？我说他的观点是不错的，但文章要改已经不可能，必须大动。既然时间来不及，我就建议先拿去会上听听反映。松林坡离报社很近，二人满怀侥幸又忧心忡忡地去了。

说吴庆举是815的思想家，也仅相对而言，他的思想充其量属于一种事务型的东西。仅仅只是个主意，而不是“主义”。在整个815战斗团，我一直以写大字报和编辑报纸出名，算是舆论界人士了，我也绝没有任何思想，只算应声虫。我的所想、所写、所行、所为，完全都是在所谓“毛泽东主义”的框架内里蹦哒。红卫兵一开始就说自己是“孙猴子”，算是不幸言中了。算你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最后还得收入如来佛的手心。文革自由带给我们的，无非是展现个人才干的机会感，以及社会认同所带来虚荣。要让年轻人得到满足，这些当然绰绰有余了。其实，吴文章的观点和刚刚发排的编辑部文章“一唱雄鸡天下白”大同小异，可等他和何国光走去松林坡，我莫名其妙就激动，平静不下，甚至有些癫狂，大约我确信他的大块文章注定要被枪毙，而很可能我马上会有一次大出风头的机会。他们刚出门，我立刻伏案动笔，一口气写了二、三千字。刚完，吴和何果然灰溜溜回来了，一脸苦笑，告我说刚开始就给哄下了台。我于是很得意了，我告诉他们新文章已经写好：一读，二人齐声说行！事不宜迟，马上又去。这次是我上阵了，走上台，我才说：“刚才，吴庆举的文章大家有意见，改了一下”，礼堂马上哄成一片，要我滚下台，我忙又讨好解释，说这是重写的，是另外一篇，听众们这才稍事安静。我把题目刚刚一念，大家果然镇住了。接着就是三个咄咄逼人的排比段：“在今天的山城，这样的走资派，不是别人，”正是谁谁谁，他们如何如何；“在今天的山城，这样的牛鬼蛇神，不是别人，”正是谁谁谁，他们如何如何；“在今天的山城，这样的个人野心家，不是别人，”正是一——当然就是首都三司、西师831、川大826之流了，文章念到：“他们在白色恐怖的艰苦时代，躲在个人主义的蜗壳里气都不敢吭一声，现在，革命快要胜利了，他们于是跃跃然蹦出‘峨眉山’，摘桃子来了，”话犹未了，全场哗然鼓起掌来。骂过之后，很快来了一段诚恳至极的自谦之词：“重大八一五有没有缺点错误？有。可不可以批判？完全可以，非但可以，而且热烈欢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更不是什么‘老虎’……我们要恭恭敬敬地永远作劳动人民的儿子，永远作革命人民的小学生。我们愿化为革命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子，让时代的列车在我们的脊背上滚滚地通过！”此时，完全就掌声雷动了，继续念完，掌声经久不息。

这篇文章，就是发表在《815战报》第十期的编辑部文章：“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们永远当革命人民的小学生”。该文和前一期的编辑部文章相比，没有任何新内容，无非更加煽情而已。笔者叙述上面这一情节，绝无半点自我炫耀的意思。没有。主张精英政治的古代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民众统治等于国家这只船行驶在风急浪大的海上，每一阵演说风吹来都会激起浪涛，使船偏离航道。这种民主政治的结局就是专制和独裁。”（第565节）文革时期的大民主，就有点这种情况，表面上，任何重大问题都会上辩论，实际的结果是：缺乏理性者越发没有理性，当无所适从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自觉地去求助和服从

于某一个保护人；有理性者，从中却稔熟了阴谋诡计和政客作风，甚至名正言顺地充当起了这样的保护人。学生们应该说是很单纯的，包括工人的绝大部分也是很单纯的，而一旦进入了政治圈子，情况总会发生变化。虽然我也是当初的造反派，我从来不否认，文革环境带给的权利诱惑和虚荣心，确让一些人堕落。

复刊后的第二期报纸，几乎也全是一哄而起的论辩文章。无非砸派如何如何的不是。除了一版的《我们》一文外，其他文章有：“就《首都红卫兵报》造谣攻击我山城革命造反派一事，我《815战报》发表严正声明”，以及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标题下、且加了编者按而转载的《首都红卫兵》报的三篇文章，还有“革联会必胜”，还有“廉罗站丑态百出，分裂会呜呼哀哉”等消息。

现在看来，“简讯”栏目中的两则小消息其实是非常要命的。一条是：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一封信，指出：“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份是革命的师生组成的。并严重警告川大八二六：‘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不知此时，川大八二六的难兄难弟西师八三一和三司驻渝联络总站作何感想？”另一条是：“二月十九日，‘左’得可爱的川大八二六，全团辩论结束后，确认大方向错了。并向毛主席、中央军委请罪；向全国人民请罪，向解放军请罪；向成都军区广大指战员请罪。”这两条消息，明确证实文革期间著名的四川“二月镇反”已经开始，从此，巴蜀大地一片腥风血雨，几十万人被投入冤狱。虽然重大815在重庆正春风得意，但在成都以及各专县串联的同学却纷纷落网。在行政区划当时尚属于四川省的重庆，与川大八二六结为同盟的西师八三一伙，当然在劫难逃。他们此后一段时间的蹦哒呼号，注定已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看来他们真的要完了。

《815战报》迫不及待的复刊，只是一场虚惊。到了3月3日出版的第十一期，一切都已风平浪静。几乎和《人民日报》一样，通版全是大好形势，全是莺歌燕舞了。第一版是“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其余几版也都是些什么“关于全团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草案）”、“坚决按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办事”、“砸烂私字，树立公字”等等。看来“革命”是有点成功的意思了。

2月25日出版的战报第十期还有一则消息需要补充一提，这就是，批判所谓西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2月19日是个高潮。这一天，正式以重庆市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的名义召开了批斗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大会。西南局文革小组刘文珍及重庆市委领导鲁大东、廖苏华诸人陪绑。他们一律被年轻人以手摁顶，反剪双手、弯腰、低头，挂黑牌。会后，以毛泽东笑容可掬的大幅画像为前导，驻军部队武装开道，将李一行押解游街示众。

批斗大会的地点是珊瑚坝。珊瑚坝是长江的一个江心岛，水枯时节便和江岸连在了一起。坝中一直保留着抗战时修成的飞机跑道，足见该岛是相当大的。消息称参加批斗会的人数达60万，估计不会有太多水份，因为笔者当时在场：江风浩荡，人头涌动，红旗乱舞，其情其景确很壮观的。消息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深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镇压和迫害的山城广大革命造反派，早就对李井泉恨之入骨，直欲将这个土皇帝千刀万剐而后快。”故而“砸烂李井泉的狗头”“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之类的口号在长江河谷萧萧风雾间喊得震天价响。报纸的印刷质量不行，且年深日久，但从第三版五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上仍能感受到批斗现场的气氛，尤其李井泉那张大特写。李的面部很不清楚了，只看见被一只大手死死摁下的头，和微微张开的嘴。头发好像掉光了，显得苍苍老迈，尤其那张嘴，分明痛苦地向前凸着，吃力地咻咻喘气。看见这幅照片，说实在的，我有些同情他，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老人。我真正对他憎恨并且不想再原谅他，是在后来。1968年，我看了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明朗的一份揭发材料，说自古富饶的四川大地饥寒满地、饿殍盈野的1960年，李还强令农村实行高指标、高征购，将农民可怜的救命粮送去北京请功。一次会议上，李甚至杀气腾腾地说：你们说四

川饿死人好？还是北京饿死人好？我看四川饿死人好。这份揭发材料很自然勾起了我对那个长达三年之久的漉漉饥饿的刻骨回忆。记得61年刚进大学，同学们饿得夜夜无法入睡，寒卧床塌，大家最喜欢梦想的就是吃一顿回锅肉，最喜欢炫耀的就是：“你吃过的最糟糕的食品是什么？”我这个城里孩子算是幸运了，最多只吃过榆树叶，吃后三天没有拉出大便。其他的农村同学则全如神农尝百草，树皮、草根、土茯苓、芭蕉根、干猪草，死老鼠……什么都吃。包括神农氏绝对没有为人类尝过的食品：观音土。只是吃了以后，必需用竹棍子到屁股眼儿去一点点把大便抠出来。几十年后，有关的历史记录当然已经很多，而当初明朗的揭发的确格外撼人心魄。近读姚锦《姚依林百夕谈》，其文有载，说当时“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陶铸（中南局）、李雪峰（华北局）直接面对基层，承受压力很大，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援外地。”文革结束后的1983年，我到四川南充市参加一个笔会。市委领导曾举办酒会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我和一位市委老干部邻座，席间，我突然想起该市不正是文革前李井泉长期蹲的点吗？老干部回答说是的。该老干部文革时也是受过冲击的。出于礼貌，我说，李井泉在文革中搞得也够惨了，老婆萧里上吊，儿子李黎风、李明清被打死，算是家破人亡了。不料老干部很肯定地打断我，说：你只看见他家破人亡，你不知道在四川，他把多少人搞得家破人亡！

下面是我1967年3月1日的日记：

“春天来到了嘉陵江。

“在那温暖的阳光下，在那淡淡的蓝雾里，山格外秀丽，路格外明亮，而那一片片洁白的沙滩中间，瓦蓝瓦蓝的江水托着一只一只的木船，慢慢地流向远方。江边，树在发芽，鸟在喧闹……

“经过一个冬天风寒考验的山城，在春天，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

“我们的战斗，不也这样么？”

3月6日：

“下午，原准备去参加段大明的检讨会，去晚了，都散会了，一个人跑进大礼堂转了一圈。这是我到山城五年多来第一次走进这个地方。

“当我踏进这个雄伟壮丽的宫殿般的大厅的时候，心潮起伏，激情汹涌。我想起了一幅画：十月革命攻打冬宫后，两个水兵正在安静的大厅里吸烟。华丽的大厅在战斗之后，弹痕斑驳，满地狼籍。这时候，我自己不也在走进一幅历史的画卷么？看一看几个月来大字报和标语的废迹，我觉得，这些不就是一场激战后留下的弹痕么？

“我非常高兴。我沿高高的石梯奔跑，我真想迎着满城的东风豪迈地歌唱：‘我们献身过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上荣光！’”

这些日记，现在读来，觉得自己整个儿就是一个傻鳖！

其实，说什么大好形势呢？说什么暗藏杀机呢？这些，都不是我们这些偏居西南一隅的娃娃们的功劳或者过错，而仅仅是815感觉最迟钝的中央高层斗争的投影而已。

十，北京的“二月抗争”和四川镇反

1967年2月，发生在北京最震撼的事件，当算几个老师 and 老将军大闹怀仁堂。此事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而文革后被改称为“二月抗争”。

关于这件事具体情况，老百姓是在一年多以后，即1968年10月中共八大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后才知道。我记得是由工军宣队大队长风雨球场传达的。其时，大学生们对于文革甚至至于对于政治都已心灰意懒。姓戴的大队长对着笔记本照本宣科地告诉大家，说1967年2月16日，有人大闹怀仁堂。某某如何如何，某某又如何如何，某某大拍桌子，以至拍断了手骨，云云。传达中，只有谭震林是直呼其名了，而且谭对党进攻火色最足，说他一不该革命，二不该入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四不该活到六十四岁。说他跟毛革命四十年，到四十一年不跟了。说罢拿起皮包拂袖而去。接着是某某叫嚷：“不要走！留在这里跟他们干！”传达完毕，我的印象就是一堆不知所云的“某某”、“某某”、“某某”……我算过，老师中除了朱德和陈毅的姓名数是两个字，其余都是三个，而朱德显然是不管这些闲事的，因此，除了晓得哪几句话是陈老总所言，晓得有人敢于和毛公然唱对台戏，剩下的某某就都莫名其妙了。几十年后，以上这些内情当然都已经不再是秘密。根据文革后公开的材料，兹将该事件补略如下：

1967年2月16日由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的日程是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回答，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就这一下，结蓄几个月的矛盾便一下子开了锅。谭震林雷声电闪，打断他：“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谭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谭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还说，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当时的中央当红左派谢富治在一旁插话劝解，说：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谭毫不赏脸，一气喷出：“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起身拿文件，穿了衣服便要退出会场，称：我不该加入共产党，不该革命，不该跟了毛主席四十年，从四十一年起我不跟了，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谭的无理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忍无可忍，断然一拍桌子，让他回来。此时，陈毅，即传达中的“某某”说：

“老谭，不要走，就在这里跟他们斗！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某某”还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会场上一个个都肝火甚旺，一个个都喜欢拍桌子。资料说，余秋里也是拍着桌子发言的：“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还是想充当和事佬，不断插话说，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李先念马上打断：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动了真感情，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插话：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些话，如果没有必要在个别地方挑剔，仅就其气魄、其胆识、其抗争精神、其威勇，真算得铁骨铮铮，义薄云天。几十年后重新读来，犹让人沧然涕下。笔者于是想起前些年读过的李锐回忆录：《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一声怨怒，开国元勋们便诚惶诚恐地跟着一哄而上，愤怒批斗仗义执言的彭德怀，那会场气氛之荒唐，发言水平之低下，让普通读者都愕然难解，只能让我想起1965年在川北山区参加农民批斗“四不清”生产队长的混乱和可笑。于是我想，“大闹怀仁堂”的可敬的老元帅、老将军们，如果他们的勇气能放在1959年的庐山，岂不我黎民幸甚！中华幸甚！历史幸甚！

不能否认，在军方气势汹汹的进攻面前，毛是作过暂时让步的。史载，“大闹怀仁堂”前十多天的1月26日京西宾馆会议，老帅老将就已经有类似表现，1月28日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显然对造反派大不利的，毛泽东却在当天马上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八条”开宗明义就宣布：“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对于刚刚介入地方工作，被某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搞得不知所措的军人来说，这不啻是一柄所向无敌的尚方宝剑。在怀仁堂事件第二天便发生了所谓“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的217信件”——后来有说法称该信件是成都军区“韦杰、甘渭汉之流”所伪造——但从逻辑上讲，说它确系中央军委真迹，无论如何是合理的。信件毫不客气地警告正在成都军区门前包围已达六天七夜的兵团和八二六群众，称：“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这种只可能出现在交战国之间、或者两个对立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威胁性语言，对于从来高屋建瓴的中央领导，确实有点不太相称。信件是以电报形式发来的，时间已近午夜，成都头顶阴霾蔽空。军区参谋某人拿着电文来到军营门口，向目无王法的造反派们严正进行了宣读，而后扬长而去。其时，虽然示威者们“鸭子死了嘴壳硬”，围在那儿，不依不饶地继续大喊大叫，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威胁军人“镇压革命群众绝没有好下场！”但有机灵者，包括一些威武不屈的头头，已经暗中溜之乎也。中国的权力当局有时候说话是很算数的，一旦动起真格来，嘴巴再硬的家伙也绝对怵着三分。事实上，在宣读信件的同时，整个成都已在调兵遣将，独立师的子弟兵们已将所有路口围困得铁桶一般。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军区子弟，上大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其时正随该校声名显赫的“东方红”驻成都机构“红色堡垒”成员一起参与静坐，形势不妙，率先跟学院的宣传车撤了。老伯母是个军医，惊吓连连地要儿子速速逃离军区大院。其时，所有路口已封，他不敢坐车，徒步出城，夤夜翻过了冬寒犹紧的龙泉驿山脊。后来知道，没撤的人全部落网候审。

面对军人铁腕，川大826的造反秀才们除了投降，还能做什么呢？下面的情况，是从当时成都一份叫《831战报》上摘抄的。这份小报是826的对立派办的，但披露的事实经过证实，无大出入。我抄下它，是想说明六十年代的真诚追随革命的大学生是多么可怜、可悲！如今读来，犹让人想替他们痛哭一场：

“217信件下达以后，八二六到处写巨幅标语：‘217信件是党和毛主席对八二六战士的最大关怀！’、‘欢迎解放军进驻川大镇压反革命！’等等；

“2月19日下午，中文系分团在校内游行请罪，化学系到军区门口请罪；

“2月20日上午，八二六勤务组发出给毛主席的请罪电；

“2月21日，川大八二六战斗团上街请罪。他们到人民南路（即现在的天府广场——笔者注），一声口令，全体下跪，去掉胸章袖套，团旗倒挂，以示请罪。

……”

这封信件同时印成传单无数，由空军驾机在全川散发。传单凌空飘飞，如乱雪之骤至，锋锐凌厉的“四川镇反运动”顷刻间如黑云压城，寒流急卷，横扫了整个蜀中大地。据有关资料介绍，短短十余天，全省逮捕“人犯”已达十万。

重大815赴蓉联络站主任、就是后来险些儿当上广东平石矿务局长又因母校一封公函而把党籍彻底搞掉的郑全体，以及其余同学多人被抓，关押于成都太慈寺。其时拘犯太多，许多临时拘留所均人满为患。重大815在川内各专、县串联的学生也多有被抓捕、捆绑、刑讯者。资料介绍，江津军分区支左领导小组主持，由永川专区公安处造反派组织出面开始“镇反运动”，先后共逮捕237人，刑事拘留746人。22日，万县军分区宣布“主力军”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还是回到重庆。

如果说四川省的“二月镇反”是以军人为代表的反文革势力对造反派的一次大规模报复，那末，公正地说，重庆的情况的确有些特殊。以重庆大学为首的815派，确实是名正言顺的主流造反派，而重庆的驻军54军确实是真心实意支持他们的。西师831、交院915，还有工人造反军，这些组织当然也是造反派，但只是支流，就人数、名气和资历（中国人很喜欢讲资历）而言，他们和815还远不在一个档次上。既然815，进而重庆的驻军如此稳健地控制着局势，大规模镇压反对派就没有必要了。这儿是说“大规模”。因为反对派不多，镇压起来简简单单，而且常常压根儿就不需要荷枪实弹的大兵出面，来点815的群众，让他们自己去斗斗就够了。他们互相间不是已经仇恨得咬牙切齿、像乌眼鸡一般吗？重庆的镇反规模大不起来。

下面是具体情况：

2月20日，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再次遭到815派砸抄，三司人员上街做毫无实际意义的游行以示抗议；

21日，“联络站”被815派砸抄；

22日，重大八一五及沙坪坝区大专院校、中学学生及工人造反派，出动宣传车及卡车20多辆，满载人员前往北碚大闹西师校园，搞所谓“会战西师”。831战斗纵队被迫“开门整风”；

23日晚，革联会组织人员砸抄设于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军总部、首都三司、一司驻渝联络站，多人被抓捕、打伤；

24日，革联会重庆市公安局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按照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委员会紧急通知，部署镇反，决定由市革联会、市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驻军代表、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临委会联合组成“打击现行反革命指挥部”，随即自上而下，建立各级镇反领导小

组及“打鬼队”专事抓捕“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

从二月末到三月初，西师831、交院915等砸派组织还有过几次比较大的活动，却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无非让老百姓感觉他们的过份和革联会的宽容，同时为革联会最终翦除他们提供一些借口而已。一次是2月27日下午，革联会在人民大礼堂召开了一个很滑稽的斗争鲁大东、解放辛易之的大会（关于这次大会，笔者下面还另有记述），西师831、交院915等以对大会造反为由同时进城示威。革联会早有布防，令军队对上清寺一带戒严，游行队伍被拦截于嘉陵江大桥至上清寺达两个小时不得动弹。再一次是3月8日，联络站及北京南下红卫兵数千人以纪念《十六条》发表8个月为由举行游行，同样在嘉陵江桥一带便遭遇815派的阻截，出面的是815的中坚：六中32111战斗团及八一兵团，两方冲突至深夜乃止。其实，砸派当时已气数将尽。前一天，即3月7日晚，831头目周荣从北京返渝，见势不妙，正打算安排全纵队分散撤离回家暂避，不料事犹未行，旋即被831中分裂出的“春雷”战斗兵团造反。北碚区驻军继而宣布西师八三一为“右派组织”，勒令解散。3月8日晚上，北碚区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四川外语学院“星火燎原”战斗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发布《联合公告》，在网球场宣布接管西师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八三一战斗纵队头目周荣、羊衍海、周德英、岳朝亮等7人被拘捕。

3月9日 驻军对后字242部队实行戒严，宣布取缔该学院反革联会的红色造反者总团，先后拘捕其头头及骨干30多人，同时抓走驻该学院的其他反革联会红卫兵29人。

3月10日 革联会建立的重庆交通学院联合夺权指挥部发布《公告》，宣告砸烂该学院九一五战斗团团部，头头8人被拘捕。

3月11日 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出《通告》，宣布开除反革联会的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交院九一五战斗团，并对河运校航锋战斗团、十三中九八战斗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战斗团给予严重警告处分。随着联络站所属个组织纷纷落马，大街小巷，到处一派请罪声。喏大山城，除了“革联会好得很”，已无戚戚杂音。街上已看不到大字报，也没有了铺天盖地的标语：天下太平了。

就在这种背景下，我正式离开了《815战报》。总团通知我说，815派现在已经掌权了，原来市委的机关报《重庆日报》就是我们自己的报纸了。革联会的意思是，从主要院校各抽一人到报社参加工作，组成新的编辑班子。时间是2月24日。当时《重庆日报》已经改为《新重庆报》，原来邓小平题的报头当然不能用了，便在鲁迅手迹里集字，拼成了新的报头。人员到齐后，报社的造反派头头邱远勋、肖学初召集我们开了一个会，说明意图和分工。他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写社论、评论员文章之类的东西。我们这个组就叫“言论组”，并指定我为组长。根据革联会的安排，我们共来了八个人，七个大学生，一个大学一个，唯一一个中学生来自师专附中。我的日记没有记录八个人的名字，只记得政法学院来的叫马岳峰，还有建工学院的张国祯——张国祯这位同学我想大家都应该记得他，因为我们来前他就一直在报社，而且一直帮忙写言论，写作速度很快，也是个日试万言依马可待的主儿。他眼睛深度近视，河南人，很少说话，成天都勤勤恳恳地笔耕不辍。而我们这帮来自各校的写作骨干，一个个好像感觉都特别良好，所以对张的文章水平有点不屑一顾的意思，大家成天就呆在寝室海阔天空地话说天下大事，而让张一个人去埋头苦干。张对此从不推辞，只管任劳任怨伏案抄写。大家管他叫“张言论”，真名字倒忘记了。几十年后，1992年夏天，我去贵阳公差，听说他已荣任贵阳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前去拜会，他竟热情如故。贵州酒乡，他开了一瓶绝对不掺假的正宗“茅台”，谈笑间，大展惊人海量，我这才看出一位北方汉子的豪气。文革那会儿，我们很少见他说话。

我临离开《815战报》时，刘福一再挽留我，非常舍不得。他说我走了，他也不想再呆

了，说得很动感情，甚至要哭起来，这使我十分感动。事实是：如果不是后来的七月大武斗，我完全就可能再也不会回到《815战报》了，也不可能有那一篇倒霉的《大局已定，815必胜》。我此生遭遇的，很可能是另外一番人生风景。从1967年二月末到七月初，我所经历许多事情都足以让我有理由和报纸彻底绝缘。问题是性格使然，让我在离开了刘福和报社四个月，再做冯妇，又回了《815战报》组阁。而刘福，以后却再没回来过。直到过了很久，他才告诉我他已经与一位女士确认了“关系”。那时说确认关系，也就是说双方已经和正式夫妻没有什么区别了，只不过尚未举行仪式和搬到一张床上生活而已。女方是嘉陵江对面一个化工研究所的技术员，胖胖的，待人出奇的热情。我过江去看了他们俩。小两口在仅可容身的小屋里煮了一碗很可口的面条招待我。那时候，对于政治，我已经心冷如灰。又到春天了，走出他们的斗室，我看见江北的田野满目青翠，太阳在薄薄的云蔼上面向大地播洒懒洋洋的温暖。绿色的麦田那边，远远的，不知谁的收音机里播放乐曲：《苗岭的早晨》。我记得还在读中学时候听过这曲子。歌词的第一句是：“你见过雷公山的山顶吗？”。悠扬的旋律突然把我拉回到只有许多好梦而对社会全然无知的少年时代——我渡江看望刘福这件事发生在一年以后，《大局已定》已被北京点名，它可能带给我的厄运已经让我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